



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 208 号

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

郑子瑜 著

出版发行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数 0 001—2 500 册
字 数 494 千字 印 张 24.375
版 本 1994 年 1 月 第 1 版
1994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39-038-4/H·1
定 价 26.00 元

出版说明

为弘扬中华文化,传播社会科学名家的优秀学术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研究,我社编辑出版著名专家学者《学术论著自选集丛书》。每种均由作者自选、自序、自传。本书即该丛书的一种。

此项工作难度较大。限于我们的水平,工作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FF66/26

自序

我自 1936 年开始学习撰写单篇的学术论著，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由于长期间工作的性质不能与学术研究相配合，读书和著述，只能在业余从事，虽然剥夺了可观的游息和睡眠的时间，作生命的透支，但结果还是事既倍而功尚不能及半；加以生活极度颠簸，难得有安定下来的时间可以充实自己，学养不如人自是无可奈何的事。

本自选集所选的论著，30 年代和 40 年代都只有一篇，即使不是年久散失，可选的作品本来也是为数无多。现在勉强选了两篇，表示我在三四十年代已经开始学习著述，也不管其学术水平如何了。

50 年代到了新加坡以后，干的虽然仍旧是非学术性的工作，但生活已比从前稍稍稳

定了，我便利用工余时间开始研究晚清最杰出的新派诗人黄遵宪，曾于1959年编著《人境庐丛考》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颇受日本“黄学”者的重视。后来（1962年4月）我应邀至日本各大学研究所（如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和大东文化大学的研究所）及学术团体（如东京汉学会、东洋文学研究会）等短期讲学，在短短的一个月里，我写了《东都习讲录》一书，由南洋学会出版。

我同时也研究中国修辞学，曾写了一二篇有关中国修辞学的小论文，在《早稻田大学学报》和《东洋文学研究》发表。1964年，我出乎意外地被聘为东京早稻田大学的客座教授（那时候极不容易看到一位非日籍的学者在日本任教授，虽是欧、美著名的学者在日本也只能为客座讲师；但因为有六位日本教授要上我的课，讲师怎能对教授讲课，所以破例聘请我为教授），对部分中国语言与文学科的教授讲授《中国修辞学》，并应邀在由全日本各大学的中国语学科教授与讲师所组成的中国语语研究会演讲《中国修辞学的变迁》。这篇讲辞长达数万言，只利用三

个星期的时间写成，疏误不全的地方在所难免，但研究所所长宫田齐教授却看重它，以为是创始性之作，建议交由研究所出版，列为研究所丛书第一种，这也可能是早稻田大学创校近百年来为校内教授出版的第一部以中文撰写的著作，使我觉得受宠若惊，不敢相信自己能有这样的光荣和殊遇，因为早稻田大学是国际著名的大学。于是我立志要写一本较为完善的《中国修辞学史》，即使没有第二次在学术机构任职的机会，甚至于终其生都无法写成，我也愿意白干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才肯罢休。

在早大短短的一年中，我还须和实藤惠秀教授共同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没有时间再从事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任满回新加坡以后，直到1978年，这十余年间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痛苦和最悲惨的岁月，真是一言难尽……，但我还是利用业余时间，自所能看到的报刊以及所能买到和借到的书本（我经常到外地去求借）去探索，如果发现只言片语是有关修辞学史的资料，我便及时抄了下来，或是复印下来，一张都不

让它遗失，静候时机，希望将来能有编写成书的一日。我也将历年来所写的有关黄遵宪、郁达夫、鲁迅、周作人的诗及其诗论的评鹭文章，辑成《诗论与诗纪》一书，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1978年）。

真是天不绝人之愿，1978年，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为了要创办外国语学研究院，来函聘请我为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讲座教授，（聘约虽然只到1980年，但期满可以续约，直到七十三岁——即1989年退休；无奈我久居热带，不能适应日本寒冬的气候，所以希望约满时能将《中国修辞学史》写成，不想久居日本），我便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把十余年来所搜得的一大叠的素材，携至日本，加以整理；同时继续寻找补充的资料，不分寒暑，不论昼夜，也不问周末和假日，只是躲在研究室，或将参考资料带回宿舍，“一生懸命”（日语“拼命”之意）地读和写，直到1980年期满离职时还不能够写完，只得将资料复印携归新加坡，继续撰制，终于1981年9月间脱稿，得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蒋学模教授的介绍，寄至上海教育出版

社，结果在 1984 年出版（其实直到 1985 年才看到了书）。

1984 年的秋天，我幸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郑德坤教授的推荐，到香港来任客座高级研究员，直到现在。在这六七年间，我数度应邀到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作报告或参加学术会议，我每利用机会，到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借书，并将《史稿》加以修订，于 1990 年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易名为《中国修辞学史》。我也曾写了一些小论文，在《社会科学战线》、《复旦学报》、《华东师大学报》、《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新文学史料》……等学刊发表。我还将自 60 年代以来所写有关修辞学的小论文辑成《郑子瑜修辞学论文集》，于 1988 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如前所述，除了 30 年代和 40 年代所写的小论文无可选择之外，50 年代以后所作的，则酌加选择，内容偏重于对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研究，旁及对晚清最杰出新派诗人

黄遵宪的研究和对郁达夫旧诗的研究、对周氏兄弟的新诗和杂事诗的研究；还有《与陈望道先生论“照应”》、《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和《汉语特殊的修辞技巧》等三篇小论文，其中《变迁》实际上是一本小著作，影响也略大。据胡裕树教授为袁晖、宗廷虎等编著的《汉语修辞学史》的序文所指：“中国修辞学界对修辞学史一类的著作向来是空白的，直到1966年新加坡华裔学者郑子瑜教授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由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出版后，才结束了这个局面。”（大意）又孙传钊在《修辞学习》发表《台湾的修辞学研究》一文，也说到此书出版后对台湾修辞学起了广泛的影响。他们都把《变迁》看作是一本中国修辞学的简史。

至于80年代以后所选的，则除了1989年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讲的《我的治学经过》和在北京参加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辞《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黄遵宪》……等三数篇之外，其余尽是有关修辞学的论著，主要是选自《中国修辞学史稿》、《郑子瑜修辞学论文集》和

《中国修辞学史》这三本书，还有几篇则是在厦门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上海各大学的演讲辞，以及选自一些大学学报的小论文。

《入境庐丛考》、《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中国修辞学史稿》、《中国修辞学史》诸书相继出版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报纸（如北京《光明日报》、《团结报》、《中国青年报》、上海《新民晚报》、广州《羊城晚报》和福州《福建日报》、香港《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以及台北的《中央日报》……等）和学刊（如《复旦学报》、《修辞学习》、《齐齐哈尔师专学报》、《杭州大学语文导报》、《瞭望周刊》和台北的《汉学研究》……等）都曾为文评介，可见我超过半个世纪以来所作的小论著，也只有有关黄遵宪的研究和修辞学——特别是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比较能受重视，所以自《中国修辞学史》一书选入本《自选集》的篇数也特别多。正如郭绍虞在《中国修辞学史稿》的序文所说：“这书是第一部《中国修辞学史》。”虽然自己看来仍有未尽妥善的地方，但初版平、精本

数万册却在几个月内迅即售罄。现在读书风气已大不如前（听说近来才稍稍好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竟能不惜工本，继续出版这一套社会科学者的学术论著自选集，已是大不容易，又肯出版像我这样久居海外而又是一个杂学旁搜的人的自选集，尤其使我又是感激又是觉得不该能有这样的荣幸。

1991年8月31日序于香港

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目 录

围棋杂考 (1936 年 12 月)	(1)
《秋夜》精读浅释 (1949 年 1 月)	(6)
谈鲁迅论陶渊明 (1952 年)	(18)
文学得揜紧科学的手 (1955 年 5 月)	(25)
谈郁达夫的南游诗 (1955 年 10 月)	(33)
荀子的宇宙观 (1956 年 3 月)	(44)
《左传》的真伪及其作者的研究 (1956 年 7 月)	(50)
利人主义的墨子思想 (1959 年 9 月)	(58)
《人境庐丛考》序 (节录) (1959 年)	(67)
儒家的伦理思想在现社会是否还有宣扬之价值 (1960 年 4 月)	(76)
马华文学的历史应该远溯上去 (1960 年 10 月)	(84)
与陈望道先生论“照应” (1960 年)	(92)
论周氏兄弟的杂事诗 (1962 年 4 月)	(100)
论周氏兄弟的新诗 (1962 年 4 月)	(118)
论郁达夫的旧诗 (1963 年)	(133)

中国修辞学的变迁 (1964 年 5 月)	(144)
汉语特殊的修辞技巧——回文 (1965 年 3 月)	(182)
关于黄遵宪诗的笺注及其佚诗 (1966 年 4 月)	(195)
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 (1978 年)	(208)
王充论修辞 (1980 年)	(225)
日本的汉学研究 (1980 年 6 月)	(234)
论先秦诸子的修辞技巧 (1980 年 12 月)	(245)
论《史记》修辞之偶疏 (节录) (1981 年 10 月)	(259)
台湾的修辞学研究 (1985 年 6 月)	(265)
编写《中国修辞学史稿》的体会 (1985 年 6 月)	(276)
郁达夫与鲁迅 (1985 年 9 月)	(295)
从日本明治时代的修辞学研究说起 (1986 年 6 月)	(300)
甲骨文谈修辞 (1986 年 6 月)	(313)
附录一: 管燮初给吕叔湘的信	(325)
附录二: 管燮初给郑子瑜的信	(325)
经传谈修辞 (1986 年冬)	(327)
《大风歌》赏释 (1987 年 4 月)	(347)
学习古汉语的目的与古汉语的修辞	
(1987 年 6 月)	(354)
谈连珠 (1988 年)	(363)
谈集句 (1988 年)	(377)
评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 (1988 年)	(392)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黄遵宪 (1989 年 5 月)	(402)

我的治学经过 (1989 年 5 月)	(424)
《黄遵宪的历史影响》序 (1990 年 5 月)	(435)
蒋祖怡著《郁达夫旧诗笺注》序 (1990 年)	(441)
《文心雕龙》论修辞 (1990 年)	(446)
《史通》论华约、辞格及其他 (1990 年)	(475)
《文镜秘府论》对中国修辞学的影响 (1990 年)	(487)
第一部修辞学的专著——《文则》(1990 年)	(506)
《容斋随笔》论修辞 (1990 年)	(534)
《茗溪渔隐丛话》论修辞 (1990 年)	(550)
《诗人玉屑》论修辞 (1990 年)	(591)
《淳南遗老集》论修辞 (1990 年)	(623)
《四溟诗话》——第一本论诗的修辞法专著 (1990 年)	(645)
《清诗话》中的修辞论 (1990 年)	(665)
清词话中的修辞论 (1990 年)	(678)
《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自序 (1991 年)	(690)
关于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 (1991 年 6 月)	(695)
谈中日文人的赠答诗 (1991 年 8 月)	(714)
蒋祖怡主编《中国古代诗话精粹辞典》序 (1991 年 11 月)	(736)
自传	(742)
主要著作目录	(760)

围棋杂考

围棋是汉魏时所创的游戏。《西京杂记》所载汉宫竹下围棋的记事，恐怕是围棋之名的由来了吧？但据《路史》所载，却说是“帝尧所作，以教丹朱者”。这样看来，在汉魏以前的帝尧时代，就已经有了围棋之戏了。

围棋的棋局——现在叫做棋枰——的形状是怎样呢？
《邯郸淳艺记》里说：

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棋子各一百五十枚。

但，这是唐朝以前的制格；唐朝以后的制格，就不同了：纵横各十九道，合三百六十一道。——见宋张拟的《棋经》。

棋局前后，不同虽是不同，但是他们的围法却同样是外面的棋子围内面的棋子，内面的棋子给外面的棋子围的——所谓“彼此圈绕以制胜”，就是这个意思。

围棋和弹碁是一样的吗？

事实告诉我们，蔡邕、魏文帝、丁廙诸子，都是有

《弹碁赋》和《弹碁经》的，书中对于弹碁所下的定义，却是：

二人对局，黑白各六枚，列棋相当，下呼上击之。

又柳宗元的《弹碁序》也说：

木局隆其中而规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又四：贵者半，贱者半；贵曰上，贱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敌一。用朱墨以别焉。

《梦溪笔谈》对于棋局的形状，说得更为详细：

局方二尺，中高如覆孟，其颠如小壶，四角微隆起。

照上列看来，弹碁和围棋，是显然没有相同的了；不过它们的不同，正也如字面的不同：“碁”通作“棋”，（虽然弹碁所用的棋子和围棋所用的棋子的数目并没有相同，但他们的质总是一样的，）只是“弹”和“围”使用的不同罢了。

至于弹碁的棋格的改变，也和围棋一样的以汉魏至唐为区分的（蔡邕的《弹碁经》，柳宗元的《弹碁序》，对于弹碁所下的定义就各不相同了）。

好了，现在就来谈谈围棋的目的吧。（为着便利起见，以下将弹碁和围棋混在一起来说啰！）